

## 戰時日方掠奪圖書問題述評

金丸裕一

### 論文摘要

有關抗戰時期日本掠奪中國大量書籍與雜誌這一問題的研究，在臺灣、中國、日本歷史學家和圖書館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至今已取得了優秀成果。不過，這些先行研究的重點大多在於解明八一三事變至南京大屠殺期間隨著戰局擴大而發生的“破壞”與“掠奪”的實態，而對日方組織“掠奪”的部門、目的以及書籍雜誌被“掠奪”後去向這類問題，大部分研究幾乎都沒有涉及到。

而且，有些研究在論述此問題時，出現了一些關鍵性偏誤，即認為一系列“掠奪”活動的實施者是日本“特工”，還認為數量龐大的書籍雜誌被帶回了日本，藏於國內的圖書館中。

本稿以當時的報刊、雜誌以及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案等為主要依據，擬就以下問題展開具體詳實的分析論證：1）圍繞此問題的有關事實究竟是什麼？；2）日方是如何處理“掠奪”來的書籍與雜誌的？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即日本史上的大正時期和昭和前期）錯綜複雜的中日關係史，大概祇有通過大量微觀性實證研究，纔能找到重新構築其全貌的線索。本稿正是基於以上認識，纔提出了這一意在探討大問題的小問題。

### 壹、緒論——問題的所在——

近年來，有關近代日本亞洲關係史的研究正迎來一大轉機。與「經濟大國」日本的凋落相合拍，以一部分國粹主義勢力「編寫新教課書之會」為中心編出的偏向教科書，在接受文部科學省大量修改要求後，通過了教科書檢定。這一事件的話題性很強，也激起了近鄰諸國的強烈反應，令人一下子覺得問題非同小可。但是，這一情況與1982年以來陸續發生的波折一樣，在學術領域見諸於解決之前，結果似乎仍是由「政治」、「外交」方面進行的論爭先行了一步。並且，由上述初中、高中教科書的採用率幾乎接近零這一

事實來看，現在日本教育界的「良心」也好，「平衡感」也好，遠遠沒有下降到令中國和韓國為首的亞洲諸國之朋友們感到危險的程度。<sup>1)</sup>

與以上問題相比，倒不如說對我們近代史研究者而言，更深刻的問題實際上就在我們身邊。即現在圍繞為加深歷史認識尤其是戰爭史認識而進行的研究，是應該尊重「感情」和「記憶」這一立場，還是終究應該忠實於作為「事實」的「記錄」？這個看似樸實卻關係到歷史學根本問題的爭論，正把日中兩國研究者卷入其中。<sup>2)</sup>筆者下面探討的是一個「小問題」，但卻是針對這種「大問題」所做的初步且基礎性的工作，目的在於為此提供一些具體的材料。

\*            \*            \*

本稿全力探討的主題是，日中戰爭（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期，日方在上海開戰到南京大屠殺期間開始的對華「圖書掠奪」問題。以下先概略整理一下這方面的至今研究情況。

有關日軍在整個日中戰爭期間各種掠奪行為的研究，至今已經積累了大量成果。在圖書掠奪這一問題上也同樣如此。試將有關此問題的情況基本上概括如下。

據受害方中國粗略推算，七七事變後「公共圖書為敵劫運者，北平約20萬冊，上海約40萬冊，天津、濟南、杭州等地約各10萬冊，其它各地雖未見列，但據情推測為數亦必不少。」，「私家藏書如海鹽、南潯、鎮江、蘇州等地，或被捆載而去，或則散失無蹤，概均同罹浩劫。」此外，「依美籍人士實地考察，估計中國損失書籍當在1500萬冊以上，內含不少稀珍古書在內。<sup>3)</sup>」

再看日方的記錄。當時日本發行的圖書方面的各種雜誌和報告是把這一行動作為「文化保護活動」來宣傳的。<sup>4)</sup>由此可知從當初開始日中之間就存在著截然相反的評價。詳情容後再述，為解決「賠償問題」而在戰爭一結束就開始編制的目錄中，也隨處可見有關圖書之掠奪與返還的史料。

戰後，這一問題被置於學術研究之俎上始於1980年代。據管見所及，由臺灣中央研究院的王聿均進行的個案實證分析研究，是這方面研究的先驅。<sup>5)</sup>此後，日本的松本剛、岡村敬二<sup>7)</sup>的研究等也相繼發表。現在，這一事實在日本圖書館管理人員培訓用教科書中也有記述。<sup>8)</sup>中國大陸則在1980年代後期記述南京大屠殺的著作中，對此事實作了零散的介紹。<sup>9)</sup>不過，真正的研究，可以說是從農偉雄、關健文的成果和趙建民的論考開始的，<sup>10)</sup>兩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吸取了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日本，當年參加「圖書掠奪」的當事者們緊閉著的嘴也開始漸漸鬆開。當然，如下所示，他們所說得都是自畫自贊的內容。由於戰爭，「中國的大學和圖書館幾乎都被燒毀，或者因難民的掠奪而丟失貴重圖書資料。……在此情況下，日軍接管的南京政府各機關的圖書約88萬冊則免於散失，與其它文物一起得到了妥善保管。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當時在滬圖書館人的功績極大。<sup>12)</sup>」還有人說這一行為是「國恥救濟」的工作，「拯救了戰火下的中國文獻。<sup>13)</sup>」這種自我評價與中國戰前戰後一貫嚴厲的評價格格不入。這表明要克服前述「感情」、「記憶」方面的矛盾與對立是何等困難。

但是，在上述以趙建民為代表的最新研究中，不僅在作為「感情的記憶」上，而且在作為「事實的記錄」上，都出現了日本方面研究中從未看到過的見解。現摘其要點如下。

(a) 「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侵略軍中配備了一批具有專業知識、受過專門訓練、相當於師團長一級的“文物接受員”，……如1938年3月，日本派出了一個由各方面專家組成的“科學考察團”來到中國南方“考察”。該團僅在南京一地就檢查了文化單位72處，特工人員多達7,000人，勞工200人，卡車810輛，收繳圖書88萬冊。在整個“考察”過程中，劫往日本的書刊比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帝國圖書館的藏書還多。<sup>14)</sup>」他在別的論文中也如此強調。

(b) 「在“南京大屠殺”前後，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劫掠的圖書總數極為驚人。它相當於當年日本國內最大的帝國圖書館的總量八十五萬冊，而同時期的日本都、道、府、縣級圖書館中最大的大阪府立圖書館藏書量纔25萬冊。儘管日本侵略軍在南京劫掠圖書的過程中，有相當數量的圖書是被作為柴火燒掉的，但他們確實把大量經過整理的重要書籍都運回了國內。這已是不爭的事實。<sup>15)</sup>」

將趙建民的見解與中國其它方面的觀點放在一起分析的話，可以引出兩個具有衝擊性的論點。第一個論點是，如(a)所述，日本進行的掠奪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並且動員了大量與軍部關係密切的特工。筆者在此將這種觀點稱為「特工說」。第二個觀點是，正像(a)和(b)所共同強調的那樣，大量圖書被運到了日本。筆者將此觀點稱為「運至國外說」。以上兩觀點所描繪出的「掠奪」形像，明確刻劃出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本質，具有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效果。但是，如前所述，在他也參考過的日方研究成果中，完全沒有言及此「事實」。我們日本學者果真是犯下了忽略這一重大史實的過失嗎？

下面將圍繞這兩個問題，盡可能從實證的立場仔細檢證，考察這一歷史。

## 貳、「特工說」之檢證——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

上述日方的研究以及趙建民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戰爭期間日本公開發表物為史料對掠奪的概要展開論述的。<sup>16)</sup>本節在參考以往研究所用史料的同時，還利用收錄於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所藏《陸支密大日記》中的檔案，<sup>17)</sup>以對此觀點的妥當性進行探導。

眾所周知，第二次上海事變爆發於1937年8月13日。此後日中兩軍迂回於租界展開激烈的攻防戰。至11月12日占領上海華界的三個月內，位置於租界外的眾多學校和文化設施遭到了破壞。隨後日軍目標南京繼續進攻。在此期間，如10月29日蔣中正在國防最高會議上的報告「遷都重慶與抗戰的前途」所示，國民政府已在摸索戰略，將撤出江南也納入了視野。11月18日國立中央圖書館「奉命隨同教育部西遷，因倉位有限，僅擇要攜出圖書一百三〇箱離開南京。一路上歷經艱辛，於次年二月纔抵達重慶。<sup>18)</sup>」文教方面受侵略之害在南京陷落以前就已十分深刻。

同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陷入慘境。在此戰局背景下，12月8日「占領地區圖書文件接收委員會」成立。

滿鐵上海事務所長伊藤武雄目睹日佔區圖書文獻類慘狀，尤其是日本士兵將圖書「燃料化」、「灰燼化」的行爲，早在11月上旬，就要求上海派遣軍特務部長採取「善後措施」。軍方以人手不足爲理由拒絕直接過問此事，但又向滿鐵上海事務所探詢如果由軍方委托時，該所能承當多少工作。滿鐵上海事務所接受此工作後，以調查課長安盛松之助爲中心討論了實施方案，確立了以滿鐵上海事務所、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和東亞同文書院三機構爲主進行接收的計劃<sup>19)</sup>。

據同委員會章程所載，其目的在於「防止占領地區……資料的散逸、搜集、整理、保管這些資料。」該組織是「執行軍特務部長命令的特務部主班」。「由滿鐵、東亞同文書院、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三機關選出的委員分擔圖書處理工作。」另外，實施要綱明確規定「重要事項」需要「軍特務部長之認可」，「接收、保管、整理及利用以軍方之需要爲優先。」上述規定12月8日以特務部長的名義向中支那方面軍參謀長作了轉達，要求各軍隊配合協助<sup>20)</sup>。下面分析一下該委員會的具體活動內容。

#### (1) 上海的接收活動

從1937年12月11日到1938年1月上旬，具體工作首先從上海開始。接收員以公共租界、法國租界以外的華界，尤其是市中心區（五角場一帶）、南市、真茹、吳淞等處爲中心搜尋了圖書和文獻。在滬江大學、大夏大學、暨南大學、上海市政府圖書館、民眾教育館、大同大學和世界書局倉庫等二十一處所「檢集」到的書籍估計有6萬或10萬冊<sup>21)</sup>。

在此須注意的是委員會活動開始的時間。委員會是八·一三事變爆發後過去了四個月，占領上海後過去了約一個月後纔終於開始收集整理圖書的。在此以前，圖書資料則等於處於任憑風吹雨打、無人管理的狀態。因此，有關這段時間由於以上狀態而造成的損毀情況以及「燃料化」和「掠奪」情況，幾乎沒有留下什麼史料。也有當年的日本人回憶說曾經將圖書當手紙用<sup>22)</sup>。接收圖書從當初開始就是按計劃而行的觀點實在難以令人苟同。

#### (2) 在南京的調查活動

接著，1938年1月19日9名委員分乘3輛汽車離開上海向南京出發。途中順至蘇州、鎮江。前者在蘇州中學、蘇州女子師範學校和長達圖書館等共十二處，後者在金山寺藏經閣、紹宗國學藏書樓等合計十三處進行了調查，對需要接收的書籍加蓋了「日本軍暫管」的封印，採取了就地保管措施<sup>23)</sup>。22日，一行抵達陷落不久的南京。

棄都南京情況更慘。從1月23日至31日，9名委員調查了各個機關。受調查的70餘處的圖書資料，「或爲水浸，或爲土砂所埋。」他們還目睹了難民們在嚴寒中因燃料不足而把圖書當柴燒的情況。在這種狀態下，除了美國系統的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大學以外，調查委員們調查了外交部圖書館、國民政府文官處圖書館、考試院、全國經濟委員會圖

書室、江蘇省立圖書館、行政院、內政部、國立編譯館、蒙藏委員會、中央黨部圖書館、中央大學農學院、教育部、司法部、實業部圖書館、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民眾教育館、紫金山天文臺、陸地測量總局、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和建設委員會等處。完成了對南京所有文化機關的應急調查。<sup>24)</sup>

### (3) 在京滬鐵路沿線的調查活動

結束南京調查日程後，一行中的兩人從1938年2月1日開始繼續前往句容、金壇、武進、江陰、無錫、常熟、崑山、太倉、嘉定展開調查，於4日回到上海。在無錫調查的是國學專修學校和省立江蘇教育學院圖書館等，在武進、常熟、嘉定調查的是各縣立圖書館等。<sup>25)</sup>

### (4) 在杭州的調查活動

1937年12月24日杭州、笕橋陷落後，1938年2月22日至26日7名委員也前往作了調查。儘管中方已經將文物疏散到了錢塘江對岸，剩下的差不多是堆空殼，但委員們還是實地考察了浙江省立圖書館（文欄閣）、浙江省建設廳和省立西湖博物館等合計26處，對認為是重要之物，則交於當地特務機關保管。<sup>26)</sup>

### (5) 在南京的圖書收集工作

如上所述，調查委員們在1938年1月下旬已經對南京的圖書情況作了事先調查。委員會「與特務機關、憲兵隊、千田兵站協商的結果」決定在杭州調查結束後的1938年3月6日開始至4月10日這段時間內，將散失於各處的圖書文獻集中於「舊實業部地質研究所陳列館及原圖書館」，並附諸實施。除10名委員參加此工作外，還動員了士兵367人次（每天約11人）、苦力830人次（每天約25人）、卡車總計310輛次（每天約9輛）。從25家機關接收的圖書雜誌總數當初估算為65萬餘冊。另外，在此期間受軍特務部委托，還調查了遺留在國際聯盟派駐全國經濟委員會技術合作辦事處的文獻資料，制成了一覽表。<sup>27)</sup>

這樣，到4月上旬，數量龐大的圖書資料，經過數月無人管理狀態後歸入日方手中。

### (6) 接收圖書後的整理工作

估計有65萬冊圖書被集中到了地質研究所。由於堆積在地上，不久就產生了一些問題。即隨著雨期，酷暑時節的來臨，不僅是書籍，就連建築物本身也可能受損。還有，陽光透過周圍的窗戶也會直接照射到書上。<sup>28)</sup>

1938年4月21日，圖書整理剛結束，委員會就表明了組織「有關圖書館設置之委員會」的希望，對在南京、上海兩地，設立圖書館的可能性進行了摸索。由於軍方舉棋不定，滿鐵上海事務所所長伊藤武雄、東亞同文書院的大內暢三、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所長新城新藏在現地視察後，向軍方提出整理圖書為當務之急。於是，1938年6月6日「接收圖書文件整理要綱」被制定出來。<sup>29)</sup>

表1 占領地區圖書文件接收委員會的構成與活動 (1937年12月-1938年8月)

姓名・經歷		職務內容			
		A. 南京的調查 1/22 ~1/31	B. 杭州的調查 2/22 ~2/26	C. 南京的 接取 3/6 ~4/10	D. 圖書的 整理 6/30 ~8/31
特務部關係者	1 佐方繁木…幹事長 (1937.12.8~12.14), 上海派遣軍司令部付少佐	幹事長		幹事長	
	2 櫻庭子郎…幹事長 (1937.12.14~1938.2.28), 陸士第25期				
	3 楠本實隆…幹事長 (1938.3.1~8.31), 中支那派遣軍司令部付大佐				
	4 渡部久…委員 (1937.12.8~12.14), 經歷不詳				
	5 林卓…委員 (1938.6.6~8.31), 經歷不詳				
	6 合原忠…臨時人員 (1938.8.1~8.31), 經歷不詳				
滿鐵關係者	7 夷石隆壽…幹事 (1937.12.8~12.21), 上海事務所調查課通商係主任				
	8 天野元之助…幹事 (1937.12.21~1938.3.4), 上海事務所調查課產業係主任, 調查役				
	9 大塚令三…幹事 (1938.3.4~8.31), 上海事務所調查課資料係主任				○
	10 山上金男…委員 (1937.12.8~1938.3.4), 上海事務所調查課勤務				
	11 林田和夫…委員 (1937.12.8~1938.3.4), 上海事務所調查課通商係勤務, 中支派遣軍特務部囑託				
	12 的場泰雄…委員 (1937.12.8~1938.6.6), 經歷不詳	○			
	13 徐炳南…委員 (1938.6.6~8.31), 東亞同文書院第24期畢業生	○		○	○
	14 津田義雄…委員 (1938.3.4~5.30), 經歷不詳	○		○	
	15 長澤武夫…委員 (1938.5.30~8.31), 上海事務所勤務, 後來工作於中文建設資料整備事務所			○	
	16 津田六郎…委員 (1938.5.30~8.31), 經歷不詳	○			○
	17 查士元…滿鐵囑託				○
	18 小島友字…滿鐵南京支所勤務	○			
	19 原田佑四郎…滿鐵調查部資料課勤務				○
	20 吉植悟…滿鐵調查部資料課勤務, 滿鐵調查部事件的時被檢舉				○
	21 田中清…滿鐵調查部資料課勤務				○
	22 大佐三四五…書誌學者, 滿鐵大連圖書館書目係主任				○
	23 青木實…滿鐵大連圖書館司書				○
	24 與謝野麟…滿鐵奉天圖書館勤務				○

東亞同文書院關係者	25	福崎峰太郎…幹事（1937.12.8～1938.8.31），第19期生，後來任職於中支建設資料整備事務所				○
	26	中馬靖友…委員（1937.12.8～1938.8.31），第27期生，華中鐵礦社員	○	○		
	27	棚島善次郎…委員（1937.23.8～1938.8.31），1936年3月文部省圖書館講習所畢業，同文書院司書	○			○
	28	寺田義三郎…委員（1937.12.8～1938.8.31），經歷不詳	○		○	○
	29	小竹文夫…委員（1938.6.6～8.31），第19期生，東亞同文書院教授，戰後任職於東京教育大學教授				○
	30	瀨尾彥次郎…第34期畢業生，江商上海支店勤務		○		
	31	原光次…經歷不詳				○
	32	大森毅…經歷不詳			○	○
	33	野田久太郎…第35期生在學中				○
	34	稻野達郎…第38期生在學中				○
	35	市村克孝…第36期生在學中				○
	36	山元靜雄…第37期生在學中				○
	37	松浦春男…第37期生在學中				○
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關係者	38	福岡重藏…幹事（1937.12.8～1938.8.31），東亞同文書院第20期畢業生，書記	○	○	○	○
	39	上野太忠…委員（1937.12.8～1938.8.31），東亞同文書院第11期畢業生，副主事				○
	40	梅田潔…委員（1937.12.8～1938.8.31），東亞同文書院第27期畢業生，書記	○			○
	41	西村捨也…委員（1937.12.8～1938.8.31），文部省圖書館講習所畢業，研究所圖書館司書	○	○	○	○
	42	宮地正吉…研究所技術員				○
	43	外山八郎…研究所技術員		○	○	○
	44	上野有造…經歷不詳			○	
	45	張柏清…經歷不詳			○	
	46	菊池三芳…南京駐在員，後來任職於中支建設資料整備事務所				○

（註） 圓符號○從事了此工作。

（出典） 根據①「中支占領地域ニ於ケル圖書標本類接收整理ニ關スル件報告」1938年10月20日付（陸支密大日記 S13～27/136），②大塚令三「南京に於ける接收文献の整理工作」（『滿鐵資料彙報』3-10）1938年，③井村哲郎編『滿鐵調査部一關係者の證言』アジア經濟研究所，1996年，④上海滿鐵會編『長江の流れと共に』1980年，⑤「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滬友會，1982年，⑥『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要覽』1936年，⑦『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十周年記念誌』1942年，⑧秦都彥編『日本陸海軍總合事典』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年等，由作者編成。

根據此要綱，滿鐵上海事務所資料科主任大塚令三訪問滿洲國大連，選定滿鐵大連圖書館書目科主任大佐三四五、圖書管理員青木實、奉天圖書館與謝野麟、滿鐵調查部資料科原田佑四郎、吉植悟、田中清為「圖書整理員」，派往南京。另外，上海的滿鐵上海事務所、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和東亞同文書院也各自「火速派出4～5名」「具備圖書整理經驗者」，並且補加了5名學生參與輔助工作。這樣，7月1日以後，圖書整理委員會的工作正式啟動。<sup>30)</sup>

在對圖書初步分類、上架之前，修整和清理保管場所、確保書架數量也成了頭等大事。尤其是書架，與書一樣都是從南京各處拆下運至地質研究所的。由於要求在兩個月這樣短的時間內完成，動員的人數為29人，多於以往。按照總人次數計算，參加此工作的人數是，整理員1,282人、士兵420人、苦力710人。共計達到2,412人次。在三大火爐之一的南京，整理人員夏天的工作，是「完全按軍隊式鈴聲行動」的「體力勞動」，還出現了「兩三個病人」。<sup>31)</sup>8月末整理工作結束。

在進行以上工作的同時，整理委員會還接收了地質學會、國學圖書館、內政部、全國經濟委員會、總理陵藏經樓、導淮委員會、衛生署、左文襄公祠和中華農學會的圖書。<sup>32)</sup>

\* \* \*

以上詳細考證了調查、整理工作的情況。那麼究竟是那些人從事了這一工作呢？筆者就此問題整理出了表1。表中所有人數加在一起纔46人，遠遠不及趙建民所說的7,000人。還有，主管這一工作的特務部在此期間人事變化頻繁，幹事長一職先後由佐方、櫻庭、楠本擔任，而整理委員之一渡邊12月中旬退出後，這一位置至後任的林上任一直空缺了半年多。以上情況大概可以旁證特務部對此工作的關心程度一向較低。並且，考察一下就可以知道，實際從事此工作者，滿鐵調查部是研究人員或圖書館方面的人，同文書院是教員或圖書工作人員，自然科學研究所也大半是圖書工作人員，還有一些大體上無法稱為「特工」的人。而且，這些人中的大部分與其說是事先計劃好參與的，不如說是當場被抓差過來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連行動過程中，從事此工作的人員，特別是圖書館方面人員的想法。即4月21日以後已經達成了「以設立圖書館為前提進行臨時整理」的默契。當然，「抗日、排日關係的圖書、冊子在建成圖書館後，一般不得公開」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對於如何處置這類圖書，有人則提出了靈活使用的建議。即把它們保管於合適的研究機構，以便「分析、探求……抗日排日心理。」更具體的方案有：①集中於南京；②集中於上海；③分置於南京和上海兩處；④根據現有機關的功能和職責範圍分配。<sup>33)</sup>真是議論百出。

與下一節內容相關，這些建議最終均未被採納。1940年發表的消息中也有催促盡快公開接收圖書的報道。<sup>34)</sup>以事實上的戰利品建立圖書館這一令中方和英美列強產生日本文化侵略印象的行爲，再加上圖書數量龐大，可能被日本回避了。<sup>35)</sup>



## 參、關於「運至國外說」——1938年9月至1942年3月——

趙建民的另一個衝擊性觀點是，近90萬冊圖書被運至日本國內。本節將以此問題為中心加以剖析。

有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戰後出版的有關對華賠償方面的資料，完全沒有提及這一「掠奪」問題。以下試舉數例。

據戰後教育部清理文物損失委員會的調查記錄，公共的「損失」書籍為2,253,252冊，其它為5,360種，411箱，44,538部；私人的「損失」書籍為488,856冊；其它為18,315種，168箱，1,215部。此數據是作為「本會各區各省辦事處實地調查所得以及公私機關個人申請登記，經本會嚴格審查之文物損失」而統計出來的。這是一份整理有詳細數量和損失經過的重要史料。<sup>36)</sup>

另據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日本賠償及歸還物資接收委員會幾乎再同一時間所作的實地調查，「歸還之書籍共計一五八，一七三冊。其中有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籍，先後分兩次空運船運回國，其餘多為普通書籍。」並且認為要「全部回收」戰時所「損失」的「不下三百萬冊圖書」十分困難。<sup>37)</sup>

但是，在以上資料中必須注意的是「損失」這一概念。從結論上來說，這裡記錄的是合計算出的數據。這一數據不僅指日方掠奪的，也包括戰爭中去向不明的圖書。就是說，無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這裡記錄的是從所有者手中丟失的圖書總數。這些丟失的圖書哪兒去了呢？幾乎沒有跡像表明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有人調查過它們的下落。

被日本掠奪去的圖書，如果限定在戰後查清下落的範圍內，倒應該參考由聯合國軍總司令部發出，經終戰連絡事務所轉發給日本帝國政府的「押收圖書關連司令文書」。從1946年3月25日到1949年2月10日這段時間內，有關調查被掠奪圖書的下落，返還圖書的指令文件，經查明與中國有關係的就達30份。這些文件的内容是下令京都帝國大學、東京帝國大學、東京上野帝國圖書館等歸還所藏「掠奪圖書」。<sup>38)</sup>

至少通過以上三類資料，根本沒有看到南京和上海合計100萬冊圖書「被運至日本」的事實。

\* \* \*

那麼，1937年至1938年，日本在中國尤其在上海，南京及其近郊掠奪的圖書，遭到了什麼命運呢？以下就其實際情況加以考察。

如前節所述，「占領地區圖書文件接收委員會」在接收文獻的臨時整理工作告終後，於1938年解散，9月後在「中支文化關係處理委員會」（設於上海）的監督領導下，整理工作由「中支圖書標本整理事務所」（設於南京）的圖書整理部繼承下來。在第二次整理工作再開的同時，還確定了分類方針和方法，編輯目錄，進而在上海、杭州成立了整理

部。1939年3月將名稱再度改爲「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sup>39)</sup>」。

整理機構頻繁更名改編，主要起因於日方隨著戰局展開而碰到的占領地統治問題。即隨著占領地的擴大，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問題不段出現，僅靠軍方已經難以處理。因而，將軍特務主持的工作移交給行政官廳以減輕軍方負擔的計劃隨之產生。這就是設置所謂「對支院」或「興亞院」的<sup>40)</sup>活動。整理、管理圖書的工作，也在1938年9月由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繼承下來。興亞院華中連絡部成立後，這一工作又在次年3月轉爲興亞院主管。

這裡要強調指出的是，圖書管理是件「文化性」氣息很濃的工作。而主管「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的興亞院華中連絡部卻認爲「難以將接收物件數量也詳細公開出來。<sup>41)</sup>」其原因可能與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以下略稱整備委員會）工作的秘密性密切相關。

興亞院的主要職責是負責統治占領地。在其傘下的整備委員會是以下列目的設立的。即在已經接收的圖書類中，「有關國民政府多年苦心經營的資料不少。」因而，「爲了翻譯建設方面的各種資料（約十萬頁），」興亞院華中連絡部當初就計劃成立名爲「中支接收文獻整理委員會」的機構。而且，爲了適應「迅速提供支那建設及確立日支經濟關係所必須的基礎資料」這一需要，按照預定的那樣，在1939年度（從1939年4月至1940年3月）開展活動。<sup>42)</sup>

如別稿所明示的那樣，「整備委員會」在其實際行動機關「中支建設資料整備事務所」（所長清水董三）下，設有「圖書整理部」（主任福崎峰太郎）和「編譯部」（主任大塚令三），以滿鐵上海事務所、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和東亞同文書院等「接收」當初就與圖書類關係密切的原班人馬爲成員，繼續從事以前的工作。不過，從1939年10月開始，大塚令三主持的「編譯部」的活動變得極爲旺盛。整備委員會迅速將中國各方面信息整理出來譯成日語，通過文獻目錄《資料通報》、雜誌《編譯簡報》、冊子《編譯彙報》，散發給了有關機關。<sup>43)</sup>通過翻譯活動大規模收集中國情報的活動由此正式展開。整備委員會從興亞院獲得的經費預算，第一年度爲389,580日圓，第二年度爲446,120日圓，合計835,700日圓。其中編譯部第一年度爲289,380日圓，第二年度爲345,920日圓，合計635,300日圓，占全部預算的76%以上。在以上編譯部的費用中，兩年間的翻譯委托費和印刷費總額達480,500日圓，也接近76%。由此可以推斷出「翻譯活動」受到極其重視。另外，從整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來看，盡管一大半是日本人，但仍有人主張需要盡可能將維新政府的官員推薦做委員，以示該事業事日中協力而爲。<sup>44)</sup>

不管怎麼說，例如《編譯彙報》在1940年至1942年3月兩年有餘的時間內，合計出版88冊，平均每日翻譯12,000字。整備委員會不「收奪」的話恐怕就難以到手的中國各種情報，尤其是全國經濟委員會方面的資料文獻、各地礦產資源、農產品等資料，就這樣成了日本的囊中物。<sup>45)</sup>

而且，在當初的計劃就要結束前的1941年3月26日，一向由整備委員會「保全」的接收圖書類，具體而言，南京88萬冊，上海約6萬冊，還有杭州清代浙江官局版木約16萬枚等，根據日本和汪精衛爲首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締結的「日華協定精神」，同時，

表 2 各種事業收支概算（1938年 6 月-1941年 3 月）

收 入 之 部		支 出 之 部	
來自特務部（1938年 6 - 8 月）	5,000日圓	整理南京的圖書、標本（1938年 6 - 8 月）	5,000日圓
來自外務省（1938年 9 月以後？）	72,000日圓	整理圖書、標本（1938年 9 月-1941年 3 月）	545,000日圓
來自興亞院（1938年12月以後）	651,000日圓	恢復天文臺、氣象臺（1939年 4 月-1941年 3 月）	170,000日圓
		整理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 （1938年 9 月-1941年 3 月）	8,000日圓
合 計	732,000日圓	合 計	732,000日圓

（註） 以上數據為概算，由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正式發表。

（出典） 根據註42的 6 ~ 7 頁作成。

為紀念南京遷都一周年，日方決定「其管理權轉讓」交給了中方。在同一天，日方還表示返還南京革命紀念館、明孝陵、學術標本類、文物等。<sup>46)</sup>南京國民政府（汪偽政權）組織了以外交部長徐良為首的「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員會」，作為返還物的接收機關，新設博物、天文、氣象等專門委員會。<sup>47)</sup>日方南京大使館日高信六郎公使和興亞院華中連絡部文化局長任其顧問。<sup>48)</sup>同年 5 月，經過雙方外交交涉，日方把至今接收的圖書類交還給了文物保管委員會。但是，日方仍然有二十一個「派遣員」與中方人員「齊心協力……進行工作」。<sup>49)</sup>

類似的情況在華北也能看到。1941年 7 月華北日軍管理的圖書類約 30 萬冊，「除了一部分在軍內使用者外，」都交還給了華北政務委員會。<sup>50)</sup>就是說，返還是日本與汪政權之間上演的「作為虛構的友好關係」的一幕。就像華北的情況所表現的那樣，必要的「情報」日本決不會放手。事實上，「中支建設資料整備事務所」也是以「接收物件文物資料的整備工作告一段落」為前提，一直到 1942 年 3 月纔解散的。<sup>51)</sup>

表 2 整理出的是從「接收」工作開始到「返還」為止，一系列工作所需的收支概算表。由此表可以看出，整備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整理、翻譯圖書資料，並且，外務省和興亞院支出的預算占一大半。綜上所述，近一百萬冊龐大數量的圖書基本上沒有被運出中國。日本倒是從這些圖書資料中挑選出了統治占領區和進行戰爭所必須的資料譯成日語，利用它們間接從事了諜報活動。而且，當任務基本上達到目的時，這些圖書又被利用來上演了「日華親善」之劇。另外，再考慮一下進行返還的 1941 年上半年的時局，在當時處於對華戰爭膠著狀態和對美、英、荷蘭關係日益緊張的情況下，日本已經沒有精力把數量如此龐大的書籍運回本土了。

#### 肆、結論——誤論的淵源——

以上，本稿就戰時日本掠奪圖書問題的兩種「誤論」進行了考察。為什麼站在「事實」的「記錄」這一立場上還會產生如此偏差呢？最後，筆者想在此談談個人的想法。

恐怕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的有些研究者研究日中戰爭時，其問題意識和框架從一

開始就已經形成了定式。

①例如，爲了論證1937年至1938年日軍以接收之名在江南地區進行「掠奪」的暴虐行爲，努力收集材料進行了實證研究。但是，對大量圖書被掠奪後是怎麼處理的，卻沒有作追蹤調查，而是僅僅列出了「損失」的數據。結果得出了毫無根據的「運至國外說」。順帶說一下，從事掠奪的「特工」7,000個人這一說法，不過是把總人次的概念與實數混爲一談的初級性錯誤。但是，它卻起到了強調掠奪是有組織的謀略的作用。

②認爲日本侵略中國，甲午戰後一貫是「有計劃」進行的這一歷史觀，是經過嚴密實證性研究得出的結論，還是憑帶有民族性的「記憶」和「感情」產生的想像呢？例如，日本史研究者經過實證研究認爲是偽作的「田中上奏文」，一直被作爲日本侵略中國和亞洲的重要證據而頻繁使用。這就是代表性的例子。

陸軍、海軍、外務省等機關，有各種根據出生地和畢業的學校形成之派閥。這些派閥即使在本機關內部都不斷進行對抗、爭鬥，要讓各省聯合起來「共同謀議」實際上近乎於不可能。本稿所探討的「特工說」，也認爲掠奪圖書是九·一八事變後日軍精心策劃的陰謀。這樣說恐怕對日軍的「文化水平」評價過高吧。如前所述，八·一三事變後的一段時間內，很多書籍被當成了燃料和手紙。並且，軍方由於沒有能力培養勝任「文化侵略」任務的人材，實際工作時也祇能動員屬於滿鐵等方面的「民間人員」。

③再看「特工說」。儘管一樣使用漢字，日語與漢語語義上的微妙差異，大概也是產生偏誤的潛在原因。例如，當初主持掠奪的確實是軍特務部。日本陸軍用語中「特務部」的意思是，爲避開軍政扶植當地政權，雖隸屬於當地部隊卻指導政務的機關。其任務是對有關經濟、產業、教育等「軍隊後方地區的各種政務事項進行指導、統治」。「特務部」指揮著散布於各地以防諜、謀略爲主要工作的「特務機關」，前者比後者的職責範圍廣泛<sup>52)</sup>。因此，日本的「特務 (tokumu)」一詞也比中國的「特工 (tegong)」一詞含義廣泛，兩者之間不可能劃等號。

\* \* \*

毋庸置疑，日中之間產生歷史認識上的落差，尤其是民族「感情」立場上的溫度差異，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中國所致。本稿作此個案實證研究時，始終強調了將這種「大框架」設定爲研究前題的危險性。當然，我對於有關以圖書爲代表的「文化財產」掠奪問題的看法，僅限於這次實證的範圍，不包括其它對象、時期、地域。在至今接觸到的史料中，也發現了不少圖書中的貴重古籍、繪畫、工藝品等體積小而價值高的東西被拿回日本的情況。另外，1941年12月8日所謂「大東亞戰爭」爆發後，上海公共租界內的敵產類以及香港的英國系統圖書館之藏書，乃至中方爲了避難而寄存之貴重圖書等也有被日本大量運回的痕跡<sup>53)</sup>。筆者認爲，通過對這些史實一一加以嚴密考證研究，「掠奪」乃至日中戰爭本質上、結構上的本來面目就會更鮮明地浮現出來。

對於正在卷入「記憶之感情」的對立的近代日中關係史研究來說，突破口在哪兒呢？這一突破口大概祇有在「以實證性研究爲前題的〈日中對決〉將會對學問的發展作出更大貢獻<sup>54)</sup>」這一冷靜透徹的學問態度中纔會發現吧。現在正是展開討論的時候。

## 註 釋

- 1) 有關此問題眾說紛紛。作為最新成果有，收錄於《日本の科學者》第36卷第9號（日本科學者會議，2001年）的〈特集：歷史教育と歷史教科書〉。該文由安田浩、山田朗、二谷貞夫、目良誠二郎撰寫的論文構成。
- 2) 特別令筆者注意的論文如下：①水谷尚子〈私はなぜ東史郎氏に異議を唱えるか一日中間に横たわる歴史認識の溝〉（《世界》1999年8月號）；②東史郎辯護團〈『東裁判』の事實を訴える—八月號水谷尚子論文批判〉（《世界》1999年10月號）；③孫歌〈日中戦争—感情と記憶の構圖〉（《世界》2000年4月號）；④溝口雄三〈日中間に知の共同體を創るために〉（《世界》2000年9月號）；⑤古厩忠夫〈「感情記憶」と「事實記録」を對立させてはならない—溝口雄三論文への反論として〉（《世界》2001年9月號）。簡單概括一下，①對於重視歷史學之「實證性」的水谷，②從「運動」角度出發的東史郎辯護團，③認為對「感情」考慮不足的孫歌展開了反駁。以岩波書店發行的雜誌《世界》為舞臺，④支持孫歌的溝口，⑤反對孫歌的古厩展開了討論。  
與此討論相關，⑥砂山幸雄〈戦争をめぐる二つの記憶—日本と中國〉（《神奈川大學評論》第39號，2001年）；⑦笠原十九司〈日中戦争の記憶と歴史學—日本と中國における南京大屠殺の記憶をめぐる〉（《専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月報》第194號，2001年）等也提出了他們的觀點。務請一閱。
- 3) 韓啓桐編《中國對日戰時損失之估計（1937-1943）》（中華書局印行，1946年）56～57頁。
- 4) 大佐三四五〈占領地區に於ける圖書文献の接收と其整理活動〉，及青木實〈接收圖書整理雜感〉（《書香》第110號，1938年），櫛島善次郎〈南京，上海，杭州ニ於ケル圖書ノ蒐集ト整理—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保管圖書ノ國民政府へ返還マデ〉（《圖書館研究》第14卷第4號，1941年），《業務概況》（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1941年）等。
- 5) 王聿均〈戰時日軍對中國文化的破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4，1985年）。
- 6) 松本剛《略奪した文化—戦争と圖書》（岩波書店，1993年）。
- 7) 岡村敬二《遺された蔵書—滿鐵圖書館・海外日本圖書館の歴史》（阿吡社，1994年）。
- 8) 小川徹・山口源治郎編《圖書館史—近代日本篇》（新編圖書館學教育資料集成⑦，教育史料出版會，1998年）134～135頁。另外，此教科書舊版本石井敦編《圖書館史—近代日本篇》（新圖書館學教育資料集成④，教育史料出版會，1989年）完全沒有言及這一問題。這大概可以證明，對掠奪圖書問題的認識是通過註(6)和註(7)的研究迅速擴大的。
- 9) “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187～189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編《日軍侵華罪行紀實》（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96～97頁，494～495頁。
- 10) 農偉雄，關健文〈日本侵華戰爭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破壞〉（《抗日戰爭史研究》1994年第3期）。
- 11) 趙建民〈抗戰期間日本對中國文化財產的破壞和掠奪〉（《檔案與史學》1997年第2期），趙建民〈略論「南京大屠殺」中的圖書劫掠〉（《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輯20，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9年）。以下將前者略稱為趙建民A論文，將後者稱為趙建民B論文。
- 12) 森清〈在滬八年 一切是空〉（《圖書館雜誌》第59卷第8號，1965年）47～48頁。
- 13) 伊藤武雄，岡崎嘉平太，松本重治《われらの生涯のなかの中國—六十年の回顧》（みすず書房，1983年）173～174頁。此部分是原滿鐵上海事務所所長伊藤武雄的發言。
- 14) 趙建民A論文，38頁。
- 15) 趙建民B論文，245頁。順帶說明一下，該論文中所稱的行政單位「東京都」是1943年才成立的。此記述不當。
- 16) 同註4）。
- 17) 〈中支特政第一二六号中支占領地ニ於ケル圖書標本類接收整理ニ關スル件報告〉（1938年10月20日，軍特務部長原田熊吉發陸軍次官東條英樹宛）。收錄於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所藏防衛檔案「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3～27」。該檔案包括以下史料：  
I. 滿鐵上海事務所，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東亞同文書院〈占領地區圖書文件接收委員會ニ關スル中

- 間報告）1938年4月。該史料以下略稱「防衛廳檔案Ⅰ」。
- Ⅱ. 〈占領地區圖書接收委員會南京圖書接收報告〉日期不明。以下略稱為「防衛廳檔案Ⅱ」。
- Ⅲ. 軍特務部圖書文件接收委員會〈接收図書文件整理要綱〉1938年6月6日決定。略稱「防衛廳檔案Ⅲ」。
- Ⅳ. 軍特務部圖書文件接收委員會〈南京地質調查所集積圖書文獻類整理要綱〉1938年6月6日決定。略稱「防衛廳檔案Ⅳ」。
- Ⅴ. 滿鐵上海事務所，東亞同文書院，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軍特務部占領地區圖書文件接收委員會報告〉1938年8月31日。略稱「防衛廳檔案Ⅴ」。
- 還有，所謂〈陸軍省大日記〉並非一般的日記，而是將陸軍省收發得公文按照年度別綴成的史料，收有「機密大日記」，「密大日記」，「普大日記」三種。詳情請參考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陸軍省大日記〉（1975年1月）。
- 18)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730頁，黃克武編撰《蔣復璁口述回憶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55頁。
- 19) 伊藤武雄等前掲《われらの生涯のなかの中國》173頁。大塚令三〈南京に於ける接收文獻の整理工作—占領地區圖書文件接收委員會總報告書〉（《滿鐵資料彙報》第3卷第10號，1938年10月）1頁。
- 20) 防衛廳檔案Ⅰ。
- 21) 防衛廳檔案Ⅰ，大佐三四五前掲〈占領地區に於ける圖書文獻の接收と其整理作業に就いて〉2頁，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前掲《業務概況》8頁。
- 22) 森清前掲〈在滬八年 一切は空〉47頁。
- 23) 防衛廳檔案Ⅰ，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前掲《業務概況》8頁。
- 24) 防衛廳檔案Ⅰ，大佐三四五前掲〈占領地區に於ける圖書文獻の接收と其整理作業に就いて〉2頁，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前掲《業務概況》9頁。
- 25) 防衛廳檔案Ⅰ，大佐三四五前掲〈占領地區に於ける圖書文獻の接收と其整理作業に就いて〉2頁，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前掲《業務概況》9～10頁。
- 26) 防衛廳檔案Ⅰ，大佐三四五前掲〈占領地區に於ける圖書文獻の接收と其整理作業に就いて〉2頁，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前掲《業務概況》9～10頁。
- 27) 防衛廳檔案Ⅱ，大佐三四五前掲〈占領地區に於ける圖書文獻の接收と其整理作業に就いて〉2頁，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前掲《業務概況》10～11頁。
- 28) 防衛廳檔案Ⅳ。
- 29) 防衛廳檔案Ⅲ。
- 30) 防衛廳檔案Ⅳ，〈大佐，青木兩氏南京へ出張〉（《書香》第108號，1938年）5頁，大佐三四五前掲〈占領地區に於ける圖書文獻の接收と其整理作業に就いて〉2～3頁。
- 31) 防衛廳檔案Ⅳ，防衛庁檔案Ⅴ，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前掲《業務概況》12～13頁。
- 32) 防衛廳檔案Ⅴ。
- 33) 青木實前掲〈接收圖書整理雜感〉5～6頁。
- 34) 森生（森清）〈上海タヨリ〉（《圖書館研究》第13卷第3號，1940年）290頁。
- 35) 青木實前掲〈接收圖書整理雜感〉6頁。
- 36) 《中華民國よりの掠奪文化財總目錄》（外務省特殊財産局，發行年月不明）。該書可能是教育部所編《被日劫掠文物目錄》及《文物損失數量估計表》的日譯本。
- 37) 《在日辦理賠償歸還工作綜述》初稿下冊（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日本賠償及歸還物資接收委員會編印，1949年）第三篇第二章第五節。
- 38) 見文部大臣官房文書課編《戰後教育事務處理提要》第2～第4集，1946～1950年各項目。
- 39) 見〈對支院設置二伴フ文化事業移管ノ件〉及該史料所收錄的「外務省文化事業部所轄事業經費預算表」1938年10月31日。（《參考資料關係雜件，興亞院關係》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檔案，H.7.2.0.4-8）。另見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前掲《業務概況》1～2，13，17頁。

- 40) 有關此問題，馬場明《日中關係と外政機構の研究—大正，昭和期》（原書房，1983年）的〈第9章興亞院設置問題〉論述得很詳細。
- 41) 〈昭和15年5月21日在南京總領事發外務大臣宛電信第185號〉（《各國圖書關係雜件》外務省外交資料館檔案，I.1.6.1.2）。
- 42) 〈昭和十四年度興亞院所管文化事業歲出豫定計算書〉（《參考資料關係雜件，興亞院關係》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檔案，H.7.2.0.4-8）。
- 43) 詳細情況在拙稿〈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とその周邊—「支那事變」期日本の對中國調查活動をめぐる習作〉（《立命館經濟學》第49卷第5號，2000年）中已作了探討。務請一閱。
- 44) 同註42）。
- 45) 見註43）。《編譯彙報》此後出版至第100輯，後述的整備委員會解散後，「興亞院華中連絡部政務調查室」及「在上海大日本帝國大使館事務所」繼續發行。此後發行的部分在日本大多散失，現在筆者正在進行調查其內容。
- 46) 〈史蹟文物を移管／皇軍の美學・支那へ贈物〉和〈史蹟文物資料移管に關する共同聲明〉（《東京朝日新聞》1941年3月28日）。另見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編前揭《業務概況》15～16頁。
- 47) 〈中支の文化諸施設を國民政府に移管〉（《圖書館雜誌》第35年第4號，1941年）294～295頁。
- 48) 棚島前掲〈南京，上海，杭州ニ於ケル圖書ノ蒐集ト整理〉237～238頁。
- 49) 〈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は呼びかける〉（《圖書館雜誌》第36年第9號・1942年）673～674頁。另外，1944年12月，文物保管委員會由委員長裕民誼及陳曾良、李聖五、龍沐勛、梅思平等組成（《汪偽政府所屬各機關部隊學校團體重要人員名錄》學海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20～21頁）。
- 50) 〈「文化」華北に還る—軍管理の圖書三十萬冊〉（《圖書館雜誌》第35年第8號，1941年）629頁。
- 51) 〈解散通知〉（綴於《編譯簡報》第2年第3號，1942年3月封面背面）。
- 52) 秦郁彥編《日本陸海軍總合事典》（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年）723頁。
- 53) 就善本而言，疏散於香港馮平山圖書館的大量古書被運回日本國內，在帝國圖書館進行了整理。見長澤規矩也《古書のはなし—書誌學入門》（富山房，1977年再訂版，170～173頁）。
- 54) 幼方直吉在〈上海文化の遺産—主として外國系圖書館について〉（《書香》第15卷第4號，1943年）詳細介紹了上海租界被接收的圖書的情況。
- 55) 劉傑〈「戰爭」に關する國際的共同研究は可能か〉（兒島襄等著《人類は戰爭を防げるか》文藝春秋，1996年）251頁。

## 〔附記〕

本稿是2001（中華民國90）年10月6日至10月9日之間，在臺北市召開的「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提出的會議論文。按會議舉辦單位的計劃，在會議結束之後，就出版論文集。但是因為各種各樣原因，直至今日也沒有能够出版。

筆者在會議之後也繼續進行著關於圖書掠奪問題的研究，特別是對於日本與中國的歷史「和解」方面之見解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祇是最近之這幾年來，在中國大陸從事研究的同行們，在他（她）們的論文或著作之中對本稿進行引用的情況越來越增加。筆者認為，對於尚未印刷出版過的論文進行引用是一種不太好的現象。所以，雖然深感本稿有著十分嚴重的局限性，但仍然決定將之公開出版印刷。

關於本稿除了對當初的錯字、脫字進行了訂正之外，其它的内容沒有作任何修正。祇有論文中的表1，採用了有著更加詳細内容的新表。希望中國、臺灣、香港、澳門的朋友們，能够對本稿以及本稿以外的其它拙文加以指導和批評。